

寻找身边「建国」们

本报记者黄筱、张璇

在我们身边，不少人的名字都是“建国”，也许是为纪念新中国成立，也许意为“建设祖国”。据统计，从1949年至今，仅浙江一省就有42000多人名为“建国”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“建国”是一个极为“时髦”的名字，在最高峰的1970年，一年就有近2000个“建国”出生。

建国——这个名字，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家国情怀，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，也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愿。

崔建国：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见证新中国体育发展

回望人生这几十年，崔建国感悟最深的是祖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而体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叫“建国”的女性不多，崔建国是其一。1952年，崔建国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她的父母像当时很多父母的想法一样，取名“建国”是希望她作为军人后代，成人后要承担保家卫国的责任。

此后，她与篮球结缘，书写了她的精彩人生：浙江远东女篮领队、前浙江女篮领队，还创建了浙江网球队。现在的她担任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，在2010年的全国锦标赛上，这组队只有一年的女篮姑娘队员们，在崔建国的带领下一举夺得冠军，并在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残运会上连续夺得金牌，如今她带着队伍正在第十届全国残运会继续征战……

“到现在还有人喊我8号。”崔建国笑着回忆，在她十多岁的时候，浙江省省体工大队到她的学校挑选篮球运动员，并被选中，从此就和篮球结下不解之缘。

1970年至1979年，崔建国在浙江女篮效力，当时她的队号是8号，打前锋位置，以快准稳取胜。入队后她先后参加了1972年五项球类运动会、1979年全运会等赛事，虽然最好的名次是第5名，但大家刻苦的训练换来了浙江女篮持续保持全国甲级队水平的成绩。这个过程中，崔建国出色的球技也深受大家认可。

不过那时候艰苦的训练环境，也让崔建国印象深刻。她说：“那时，运动鞋一点都不耐磨，我们三天两头要去青年路找一位老先生修鞋。每个队员进队领了两套队服和两双回力鞋，这些是一整年的行头。”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，也给体育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。浙江省开始建立多项目体育队伍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崔建国接到一个任务，组建浙江网球队，其中多名队员被选为国家队队员，曾在亚洲锦标赛取得团体冠军。

虽然和篮球分开了，但在2004年左右，她又回归浙江省女篮，而且这一次是以教练的身份回归，带着新一代篮球女将们迎战各类赛事。即使到了现在，崔建国上街还能被不少关注体育的“粉丝”一眼认出，这些“粉丝”中有出租车司机、超市收银员、炒货店老板，一张口就问：“你是那个8号吗？”

2008年，崔建国退休了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



▲ 崔建国（浙江听障女篮队教练）



▲ 石建国（90后“抹灰哥”）



▲ 邵建国（引航员）



▲ 陈建国（音乐人）

“从1949年至今，仅浙江一省就有42000多人名为“建国”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“建国”是一个极为“时髦”的名字，在最高峰的1970年，一年就有近2000个“建国”出生。建国——这个名字，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家国情怀，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，也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愿。”

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等着她。2011年，浙江要举办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。作为主场作战，2009年末，崔建国受命开始带训浙江听障女篮队。

“当时的她们完全是白纸一张，有的孩子甚至连传球运球都不会。”崔建国记得，第一次在浙江省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见到这群弟子时，心中有些茫然和失落。然而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交流，由于大部分队员都患有重度耳聋，崔建国的话语对她们来说是一片静默……

在组队后的第一堂训练课上，崔建国用笔在白板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：我们是平等的。因为对她来说，沟通的前提是信任，而信任的前提是平等。面对眼前一个个成长在乡村，生活在寂静世界里的十六七岁聋人孩子，只有让她们相信在这里可以平等的生活相处，她们才会遵守教导，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。“我还记得，就在我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孩子们眼神和之前不一样了。”

彼此的心敞开了，就要解决沟通的问题。为了让队员了解篮球的技术要领，崔建国在用纸笔交流之外，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要亲身示范，对抗、防守、配合，用她的话讲，只有让队员亲自感受到肌肉的力量与紧张感，才能明白篮球的精髓所在。除此之外，她独创出一套“崔氏手语”。

提到这个，崔建国忍不住笑了：“赛场上怎么简单怎么来，日常的手语太繁杂了，在训练时，我说这个手势是‘阵地’，它就是‘阵地’。因此这套自编自修的手语只有自己人看得懂，别人都摸不透，这也算是一种战术吧。”

在她的带领下，队伍成绩斐然：在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残运会上连续夺得金牌，不少队员还被选为中国听障女篮队员，代表国家在2017年参加第27届听障奥运会上获得第七名的好成绩。

崔建国说，少女时代篮球是爱好、是梦想、是追求，时间和汗水换来的是荣耀。现在，篮球是传承，要把女篮团结拼搏、为荣耀而战的精神，手把手地传下去。

作为听障女篮教练，这一路走来，崔建国感觉自己见证了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史。“我的身高是175厘米，当时这身高好像很高了，现在身高2米左右的选手很多，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大体格越来越好。”

“现在的中国是体育强国，残疾人体育运动也越来越被重视。去年，浙江省残疾人体育队伍还新增了很多项目，例如残疾人单板滑雪队，目的是为2022年北京残奥会做准备。”

崔建国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体育事业，回望人生这几十年，感悟最深的是祖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而体育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。“现在是强身健体、全民健身。现在健身房，各种体育设施也是很先进的。”

目前，崔建国正带领她的球队，征战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，“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后来者们，发挥女篮精神，为国争光。”崔建国说。

石建国：90后“抹灰哥”的工地书法梦

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灰工，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家，但我觉得能一辈子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，是一件很厉害的事”

一场暴雨过后，在杭州城北郊区一处建筑工地上，结束一天工作的石建国和工友们朝着附近宿舍走去，沿着一条仅一人宽的泥泞小巷，跨过几处污水排放沟渠，石建国穿过几排移动板房后走进自己的铁皮小屋，推门进去竟有一阵微微的墨香迎面而来。

1991年出生的石建国是叫“建国”的人中，为数不多的90后，他说自己也认识几个同名的朋友，但最年轻的也有四五十岁。“我生在河南濮阳的农村，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没有什么文化，给孩子取名也比较简单，我叫建国可能就是爹妈希望我能建设祖国，能给社会做点贡献吧！”

在云南做过汽车修理工、在新疆做过桥梁工人、在上海船厂做过电焊工，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

方，但石建国心里一直揣着一个“书法梦”。初中时学校发了一本《书法艺术》课外书，里面大多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，“别人的字写得这么好看，如果我也可以就好了。”石建国如获至宝，常常拿起书翻看，还专门买了毛笔和墨汁开始练习。

后来在忙碌奔波的工作中，他与“书法”渐行渐远，但始终无法放下，想着有朝一日安定下来一定要好好练习书法。2013年他跟着两个哥哥在温州安顿，在建筑工地上做抹灰工，一干就是五年，工棚外搭个简易桌子，铺上废报纸，拿起毛笔就开始勤学苦练，工地上经常从早晨五六点开始，持续到傍晚五六点，有时一天工作下来很累了，但拿起笔，石建国一下就有了精神，晚上一两个小时依然还有兴致。

工友们喜欢打牌、打游戏消磨时间，石建国对这些都没兴趣，只喜欢练字，利用有限的时间去实现“书法梦”。几年练习下来他的字也“有模有样”了，2017年5月石建国鼓起勇气在一短视频平台注册并取名“温州抹灰哥小石”，在练习书法时让工友录个小视频，或者来一场“直播”，视频中的他常常穿着沾满灰泥的工服，踩着一双工地雨靴，有时手上和头发上还沾满粉尘，就这么“灰头土脸”地开始直播了。

最初只是想督促练习，没想到关注的人越来越多，粉丝们的鼓励使他有很大动力去坚持自己的梦想。”2018年夏天，杭州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在网上看到石建国的视频，很佩服他坚强的毅力，专程派人去温州工地找他，邀请他到杭州工作。

想到妻子带着女儿在富阳打工，自己在杭州工作也能离家人更近一些，石建国同意了。过年时他为公司的员工写了几百副对联和“福”，同事们回家行囊里又多了一份特别的“年货”，公司给他一千多元作为奖励，石建国一分未收全部捐给了福利院。

石建国说打工挣钱不容易，他平时练习字时纸张基本上都是反复使用，能省就省，练字的笔墨纸也都是在淘宝上买便宜的。他偶尔也买些书籍临摹，“我现在水平还很一般，只能算是书法爱好者，行书写得比较多，但是楷书还找不到方向，近期我的目标是提高楷书的水平。”

对于书法梦，石建国并没有因在网上走红而沾沾自喜，反而更加谦虚低调，扎实学习。

在石建国狭小的工地上集体宿舍里，除了过道，最大的一块空间则是他的书桌，几十支大小粗细不同的毛笔和四壶墨汁整齐排列，旁边还有几块木板做成的尺镇和几本书法书，由于工地建设即将结束，同宿舍的室友都“转战”到其他工地上了，这里俨然成了他的一方小天地，每张高低床床板上都摆满了他的书法作品。

每当一个工程完工要辗转下一地时，他便把这些陪伴在身边的“宝贝”小心翼翼地打包收好，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灰工，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家，但我觉得能一辈子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，是一件很厉害的事！”

邵建国：做好“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”

“得益于国家的兴盛，让我们港口发展迅速，也让引航工作越来越被重视和需要，我也真正找到了职业的自豪感和幸福感”

“外籍船舶进港时，引航员是第一个登轮的中国人，也是第一个与船员进行面对面交流的中国人，我们不仅要保障船舶安全进出港，更要展现好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，因此有时也被称为‘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’。”在引航员岗位上工作了将近20年，邵建国谈起这份工作的职责时依然充满自豪。

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外国籍船长对中国的引航员存在不同程度偏见，尤其是对引航员的专业素养持怀疑态度，而随着中国海洋实力

的迅速发展，航海技术提升，引航员的专业素养越来越高，外国籍船长和船员对中国引航员的态度也有了巨大的改观。“得益于国家的兴盛，让我们港口发展迅速，也让引航工作越来越被重视和需要，我也真正找到了职业的自豪感和幸福感。”邵建国说。

当年他实习时，船到日本的东京港，进港时第一次见识到引航这个职业，被引航员的职业成就感深深感染，“从此，成为一位引航员成了我的梦想，觉得这是一份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工作。”

18年前，舟山港在急需引航人才时，他毅然放弃了在上海一远洋运输公司的高薪岗位，选择到舟山引航站做一名普通的引航员，成了该站建站以来的第一位十位引航员。

自此以后，邵建国从头开始一点点学习，包括舟山海域特点、航道、水深、水流、航标设置等，收集潮汐、气象、航道、水流、码头资料和航道变迁、小型船舶活动规律，驾驶散货船、油化船、集装箱船、特种船、LNG船等各类船舶的技术，不断吸取前辈们的宝贵经验，通过这些年来的努力和实践，最终成了一位经验丰富、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引航员。

引航员的工作主要是完成船舶的进出港航行和靠离泊位，这是船舶驾驶过程中两个难度最大的环节，也隐藏着高风险，大型船舶总价值动辄上亿，轻微碰撞的损失就要以千万计，如果是大型油轮，一旦发生碰撞造成原油泄漏，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。

引航过程中经常会有紧急情况发生，邵建国说，曾遭遇过一艘从中东开来的载满30万吨原油的船舶，航行至舟山港虾峙门深水航槽时，突然舵机故障，短时间内无法控制方向，面临着搁浅与碰撞的危险，凭着多年引航实践经验，邵建国快速沉着应对，最终引领船舶至安全水域，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。

除了引航时船舶的安全，同时还要存在人身安全问题，每次引航时，引航员都需要登上好几层楼高的软梯上船，遇上大风暴，在颠簸起伏的软梯上，每一步都潜藏着危险，稍不注意登船时机，很有可能会被夹在小艇和轮船的中间或掉落海里。

如今引航员不仅要求专业技术过硬，还需要良好的沟通技巧，邵建国说，“欧美的船长比较傲慢，菲律宾、印度的船长则比较细琐，我们要因人而异，不能让驾驶台工作环境变得死板、压抑，要懂得如何面对船员，调动驾驶台所有的情绪，就像外交官一样。”

引航员是国家发展大潮里形形色色岗位中的一种，也是中国海洋实力不断增强的一面镜子。邵建国说，舟山引航站自1983年建站后到2000年前，平均一年为外轮引航的艘次仅500艘左右，而现在全年服务艘次达到一万余艘，引航员也增加到67名。“我刚来的时候引航员仅有在舟山本岛附近的几个码头工作，现在从南到北跨度达100多海里的范围，很多的岛屿都建有大型泊位，我们引航员的足迹遍布了整个舟山群岛。”

近年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、国家自贸试验区等多项重大政策在舟山落地，更加快了港口的发展，港口服务的专业化、高效化对引航员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“希望我们能做好‘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’，给每一艘外轮带去最好的引航服务！”邵建国说。

陈建国：传承恩师精神把音乐带到更多地方

“人人有材，亦无全才，因材施教，人人成才。”陈建国说，“这是周老师的教育理念，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享有学习音乐的权利。”陈建国深以为然，投入大量的金钱、时间和精力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

“溪水清清溪水长，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……”说到最能代表浙江的歌曲，《采茶舞曲》

能算其一。1958年，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在温州泰顺东溪土楼创作了《采茶舞曲》，从此在这片土地上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。

同样与《采茶舞曲》结下不解之缘的，还有周大风的学生陈建国，如今他是周大风纪念馆的馆长、浙江大风艺校校长。为了将恩师周大风的音乐理念继续传承下去，他举办专业和普及的音乐会600多场，九成以上都是公益性质；带音乐老师进山区和农村，自费购买乐器，圆孩子的音乐梦；还在《采茶舞曲》创作地东溪乡成立了大风艺校东溪分校……他身体力行，把音乐带到了更多需要的地方。

1983年，时任浙江省音协主席的周大风，在杭州办了一个浙江社会艺术学校（后改名为浙江大风艺校）。出于对音乐的热爱，陈建国报考学校，成了第一届学生。回顾两年短暂的学习，陈建国觉得这是影响他一辈子的学习经历，“大风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使我一生爱上音乐，更教育我做人做事，他的教育观念更是影响着我。”

陈建国的梦想是当一位音乐家，艺校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和音乐有关，是在半山文化馆担任音乐干部，在那里几乎学遍了所有的乐器：钢琴、长笛、萨克斯风、二胡、笛子、架子鼓……为了把自己彻底钻进音乐里，他去琴行打工，在杭州乐器厂学习制作小提琴，在广州钢琴厂学过调律。

1997年，他回到杭州开始创业之路，开了自己第一家琴行，凭着陈建国的努力，琴行生意愈发红火，乐器还远销至江苏和安徽等地。后来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，他还开了四家分店和一家乐器厂。

2004年，81岁高龄的周大风希望寻找一位琴行老板资助一个公益合唱团，但是接连谈了几家琴行都未能成功，最后他找到了学生陈建国。时隔20年，陈建国对老师的景仰之情未曾改变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大风的要求。随后两人一起做了很多音乐和公益的事，两人也由最初的师生关系变成了莫逆之交。

“人人有材，亦无全才，因材施教，人人成才。”陈建国说，“这是周老师的教育理念，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享有学习音乐的权利。”陈建国深以为然，投入大量的金钱、时间和精力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。

一次去剧院的经历让陈建国心酸——台下位置有九百多，却只稀稀拉拉坐了一百人。“我想培养一群爱音乐的人，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。”

为此，陈建国特意去考了演出经纪人资格证书，出资成立了知音民乐团。随后又和红星剧院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、宁波音乐厅等单位联合组织“开启音乐之门系列”公益活动与演出，为青少年普及高雅音乐。

陈建国说，他第一次走进浙江盲人学校慰问演出，也是在周大风先生的带领下。“那时候老师已经80多岁了，还亲自上台讲解音乐故事和弹钢琴伴奏，在和盲人小朋友握手时噙着泪水，一直叮嘱我说，他们虽然看不见光明，但是耳朵很灵，学习音乐很好，希望我多关心他们。”

至今这个感人的场景仍深深触动着他，让陈建国坚持在地处富阳的浙江盲校，持续三年做公益器乐教学，每个礼拜抽出两天时间，陈建国会全程带着琴行老师，风雨无阻去富阳给盲人孩子上课，帮助他们成立了盲人民乐队。令他骄傲的是，这个盲人民乐队还在多个比赛中获奖。

“传承大风精神，让农村、山区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。”陈建国说。2004年周大风重返《采茶舞曲》的创作地温州泰顺，回杭州后时常跟陈建国提起，泰顺东溪乡有个百年小学非常了不起，在这个大山里面能有这么一个学校，说明当地对教育的重视，希望大风艺校的老师能够去支持发展大山里的音乐教育。

2017年，陈建国和泰顺县东溪乡合作办了周大风《采茶舞曲》纪念馆，又继承周老先生的遗志在东溪小学成立了大风艺校分校，陈建国现在还有个特殊的身份——东溪乡“荣誉村民”，传承恩师周大风的教育理念，在东溪乡让更多孩子接受音乐的熏陶，还自掏腰包给孩子送去十万的音乐器材，定期带老师进山授课，为孩子辅导，圆了不少孩子的音乐梦。

虽然忙碌，但陈建国说，“我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，我也同样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，一起为音乐而忙碌。你说的话，你做的事，有可能一辈子有人记住，我想这就值得了。”